

# 道德冷漠与道德教育

高德胜

[摘要]道德冷漠，即责任推拒和道德麻木，表面上看只是对责任的否定，实际上则是对人性的否定，带有非常严重的人性和社会后果。道德冷漠在现代社会有一套完备的生产机制，包括精细分工对道德的钝化、现代组织的去道德化、电子媒介对苦难的饱和性暴露等。教育不能冷漠，应该通过将学校建成学习共同体、培养受教育者的媒介与网络批判意识、远离道德的建构等多种方式抵御道德冷漠的蔓延。

[关键词]道德冷漠；道德教育

[作者简介]高德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

## 一、道德冷漠及其后果

冷漠就是对人或对事冷淡、不关心，道德冷漠(moral indifference)就是对道德的冷淡与不关心。这种冷淡与不关心既可能是一种主动的责任推拒，也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道德麻木，即在面对道德问题时没有反应，意识不到道德问题的存在，体会不到道德的召唤。

面对“他人的痛苦”，很多直接或间接的旁观者不是没有同情，只是没有行动。“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sup>[1]94</sup>所谓“宣布我们的清白”，是指我们同情他人的痛苦，足以表明他人的痛苦不是我们导致的，与我们无关；所谓“宣布我们的无能”是指我们虽然同情他人的痛苦，但我们在减轻、消除他人痛苦方面无能为力，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人的痛苦”既不是我们导致的，我们又无能为力，冷漠是必然的结果(同情之中的冷漠)。比如，面对贫困人群，我们不是没有同情，但这种“细若游丝”的同情很快被“坚硬如铁”的责任否定所冲淡：他们的贫穷不是我们造成的，作为个体，我们能力有限，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脱离贫穷。

主动的责任推拒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将道德看成次要的价值要求，将道德置于其他价值要求之后“叨陪末座”。用利波维茨基(G.Lipovetsky)的话说，就是“幸福凌驾于道德命令之上，享乐凌驾于禁忌之上，诱惑凌驾于约束之上。”<sup>[2]36</sup>不是不要道德，而是道

德与个人的幸福、享乐、满足相比是次要的，个人优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幸福与快乐，道德则被排在可以忽略不计的末位。比如，面对生态灾难给贫困人口带来的痛苦，享受着高度物质文明的发达国家的富裕人口不能说没有一点同情，只是一旦要其牺牲哪怕一丁点的物质享受来减轻那些贫穷人们的痛苦，也是不可能的，别人的痛苦与自己的物质享受相比算得了什么？

如果说主动责任推拒是一种有意识的道德冷漠，还包含着微弱的道德挣扎的话，那么无意识的道德麻木则是一种彻底的道德冷漠，道德之门已经结结实实地关闭，看不到哪怕一丝一毫的道德亮光。当然，无意识的道德麻木也有不同的层次。失去了起码的“道德嗅觉”，不能感知别人的痛苦，意识不到道德问题的存在，没有道德冲动，这是第一层次的道德麻木；将他人的痛苦、苦难、甚至牺牲当作娱乐和消遣的内容，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与伤害之上，这是第二层次的道德麻木。

表面上看，道德冷漠只是对自己责任的否定，实际上道德冷漠是对人性的否定，或者说是人性的堕落。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孤悬于世的生命，而是融他人于自身的关系性存在，是“与他人共在”、“为他人而在”的。道德冷漠否定的恰是人的这种本性，扭曲的是与他人之间的形上关系，“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sup>①</sup>我们可以沿着萨特的思路继续：如果他人是地狱，那我们是什么？我们不也是别人的地狱、自己的地狱？因此，道德冷漠表面上是对他人的漠视，实际上也是对自我和人性的漠视。也就是说，“道德冷漠是从道德的源头上否定了道德，这种否定是一种彻底性的否定，结果是一切其他的不道德都算不了什么。”<sup>[3]</sup>

道德冷漠不会只停留在个体德性的层面上，一定会以各种方式获得社会表达。在吉尔·利波维茨基眼里，我们已经进入“后道德社会”。“后道德社会指的是责任感淡化，且其约束力也日渐苍白无力，自我奉献的精神变得与社会格格不入，道德也不再要求个人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做出自我牺牲，主体权利支配了绝对命令，道德教育则被宜居胜地、阳光假期和大众娱乐所替代。”<sup>[2][3]</sup>在费夫尔(R.W.Fevre)看来，现代社会则是一种“非道德化”社会。所谓非道德化，“既是指由于道德从我们的生活中被剥离出来使我们脱离道德这一过程，也是指我们的文化已经失去目的性这一状况。”<sup>[4]</sup>无论是“后道德社会”，还是“非道德化”社会，其实都是指由个体道德冷漠积聚而成的社会道德风气与道德状况的恶化。更可怕的是，社会道德风气与道德状况的恶化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以战争、屠杀、甚至种族灭绝等尖锐而极端的形式暴露出来。齐格蒙特·鲍曼(Z.Bauman)等人的研究揭示了现代文明与纳

粹大屠杀的关系，指出现代文明虽然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sup>[51]</sup>自二战以来，道德冷漠及其社会表达呈弥散之势，成了当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常态。考虑到当今人类所掌握的武器的毁灭性，如果道德冷漠“集腋成裘”，进而引发全球性的战争和大屠杀，人类前景着实堪忧！

## 二、道德冷漠的现代生产

道德冷漠不是单纯的现代现象，前现代社会同样存在着道德冷漠现象。只是到了现代，道德冷漠有了更坚实的社会基础，有了一套体系完备的生产机制。

### 1. 精细分工与道德“钝化”

现代分工对现代社会，尤其是对现代经济的贡献无法估量。同时，现代分工也使现代人从事无巨细的繁杂劳动中“脱域”（吉登斯语）出来，只专心做好自己的“那一份事情”，起到了解放人的作用。正是因为现代分工的这种好处，现代分工越来越细，已经推向了极致。

推向极致的现代分工，其对现代人的损害也是推向了极致的。精细分工在“解放”人的同时，也在“毁坏”人，用雅卡尔(A. Jacquard)的话说就是精细分工制造了“孤立的个体”、“残废的个体”、“失望的个体”。<sup>[6]</sup>“孤立的个体”是指精细分工使人们局限于自己的狭小专业领域，越来越难以与专业外的人进行沟通；“残废的个体”是指精细分工使人只具有专业特长，特长之外的基本能力严重衰退，变得“单面、残废”；“失望的个体”是指细碎的分工使多数人看不到自己在最终产品或某项任务中的作用，觉得自己可有可无、什么也没做，没有成就感。

精细分工导致的人的变异从不同的方向“钝化”着道德。“孤立的个体”阻断了人与人的交往，使个体“被自己的皮肤包裹起来”，不易走出自己、走向他人，窒息了人的道德感。“残废的个体”当然包括“道德上的残废”，因为“如果一个人只让他自己服从于一种目的或一种活动，他实质上就会丧失他的人性。”<sup>[7]</sup>“失望的个体”同时也是“道德钝化”的个体。细碎的分工既使个体看不到自己的贡献，也使个体看不到自己的过错与责任。巨大的成功是别人的，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反过来，巨大的错误，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罪恶也是别人的，自己的行为不过是这罪恶链条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环节，发挥的作用很小，所以没有罪恶感。也就是说，精细分工使几乎每一种事情都需要很多人来共同完成，每个人都只能完成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单个人的行为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非常遥远、间接、脆弱，个体几乎无法看到自己行为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如果最终结果是正面的，即使不能那么理直气壮，也还是有人会跳出来“邀功”；如果最终结果是负面的，避之惟恐不及，谁会承担

责任?精细分工必然导致这样一种道德困境:“有罪过,但无犯过者;有犯罪,但无罪犯;有罪状,但无认罪者!”<sup>[8]21</sup>

精细分工还导致现代人价值感和安全感的丧失。“在现时代,人们是像沙粒一样被搅和在一起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他不是他自己,他除了是一排插销中的一根插销以外,除了是有着一般有用性的物体之外,不具有什么真正的个性。”<sup>[9]</sup>精细分工使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有用的、可替代的物体,否定了一个人作为人的独特性和价值感,而独特性、价值感正是一个人承担道德责任的前提。试想,作为一个“物体”,我什么价值都没有,还有什么必要对他人负责、承担道德责任?每个人都是可替代的,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要面临着被替代的危险,不安全感是深入骨髓的。在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人们觉得周围的每个人都是事实上或者潜在的替代自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的只是对他人深深的戒备和敌意哪里还有同情和道德的容身之地!

## 2.现代组织的去道德化

现代社会有两个强势的组织类型,一个是官僚机构,一个是商业机构。尽管这两个机构在很多方面差别巨大,甚至互相抵触,但它们在对待道德上的态度却是完全一致的:摆脱道德的束缚,消除道德压力,使自身置身道德之外。

官僚机构,也就是所谓的科层制(bureaucracy)“已成为主导性的组织制度,并在事实上成了现代性的缩影。除非我们理解了这种制度形式,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今天的社会生活。”<sup>[10]</sup>那么,科层制有什么特点呢?首先,科层制强调程序和规则,成文的规章制度在官僚体系中具有优先地位。对规章制度的严格遵守是官僚机构的意识形态,代表是个体对组织的忠诚,被赋予很高的荣誉。组织中的个体行为的最终依据不是个人的良知,而是组织的纪律与规定,“惟有组织内的规则被作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经变成了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个人良知的权威性。”<sup>[5]30</sup>也就是说,即使个人良知告诉自己,组织要求做的事情是错的,但因为组织的权威性,不但依然要去做,而且要做好、做得出色。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已经穿上了组织规则这一“紧身衣”,被组织规则扼住了咽喉,发挥不出什么作用了。

生活在科层制下的人,一开始也许会有良知的不安和内心的激烈冲突,但随着科层生活的持续,这种不安和冲突会慢慢消弭,直至成为完全按规章制度自动化行动的“机器人”。科层制下生活久了的人,逐渐感觉不到机构的外在勉强,而是主动的排斥道德,将规章制度作为一种“掩体”,将一切道德要求挡在这一坚硬的掩体之外,自己则躲在制度和规则背后不肯现身,因为按规则和制度办事是最安全、最节省的方式。医生作为一个人,不

能见死不救，不能因为孕妇丈夫不签字而不给孕妇进行手术，但因为有制度和规则，医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按规则和制度办事，至于孕妇和孩子的死活，则与我没有关系，也追究不到我的责任，我是按规则办的!收费站的收费人员，作为一个人，不能因为救护车不交钱而眼看着难产的孕妇垂死挣扎，但制度和规则规定救护车过收费站必须交费，所以就可以眼睁睁看着孕妇难产，因为是按规则办事!因此，“处于官僚主义行为轨道里的人不再是负责任的道德主体，他们的道德自主性被剥夺了，并且他们被训练成了不执行(或相信)他们道德判断的人。”<sup>[11]</sup>

第二，科层制将人功能化。在科层体系中没有个性丰富的人，只有标准的社会角色。有丰富个性的人往往是科层制运转的障碍，而标准的、功能化、可替代的角色才是科层制顺利运转的保障。在一个等级森严、井然有序的官僚体系里，相互照面的不是一个个的人，而是一个又一个社会角色。社会角色就像一套千篇一律的“工作服”，穿上之后，我们的行为都是在它的支配下完成的，似乎与我们自己无关，即使犯下了错误，那也是职务错误、角色错误，与“工作服”后面的人没有关系。下班之后，我们脱下“工作服”，也就解脱了所有的与之相关的责任与义务。也就是说，角色与人发生了分裂:作为人，我们或许还有怜悯和同情;作为社会角色，我们没有、也不允许有道德冲动。

商业机构在内部结构上也多采用科层化的组织方式，在以科层机构的特性排斥道德的同时，还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去道德化机制。现代商业自从从家庭中分离出来之后，就“在一片完全属于自己的全新空间中扎下了根，商业就没有了束缚。它现在可以不再为‘道德责任’烦心，不仅如此，它还可以而且的确阻止了道德情感进入那些进行商业决策的烟雾缭绕的房间。”<sup>[14]序言4</sup>商业的黄金律是效益，是利润，其他都是次要的、可牺牲的。“在商言商”，短短四个字，就彻底道出了商业对道德的彻底放弃。不是说商业机构完全不要道德，商业也有自己的“商业伦理”，但“商业伦理”的中心不在“伦理”，而在“商业”，这里的“伦理”也是为效益、利润服务的。“商业伦理”之外，一切与效益、利润相矛盾的情感、道德都是不合时宜的，哪怕是最人性的亲情，因为“商场无父子”。

### 3.电子媒介与“苦难饱和”

现代社会是科技昌盛的社会，现代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物质欲望，消除了我们对世界的恐惧，使我们在自然面前成为“说一不二”的主人。正是因为科学的巨大能力，使科学成了希望的源泉，成了信仰，成了一定意义上的“上帝”：“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以专门的非个人性的知识为基础的世俗社会，这个社会赋予科学家和科学知识的地位

如同我们的前辈承认牧师和宗教教义所拥有的地位。”<sup>[71]</sup>但现代科技本身存在着“结构性非道德”，即现代科技对道德的排斥是内在的、结构性的。<sup>[12]</sup>

科技的“结构性非道德”会通过迁移而转化为人的道德冷漠，因为现代科技是现代人的幸福源泉、是现代人所信仰的“上帝”，其态度对现代人来说就是“绝对命令”。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都有道德感觉和道德判断，轻易不会去做有悖道德的事情，但如果科学要求人们去做这样的事情，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米尔格兰姆实验”<sup>①</sup>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实验中的人不是没有道德，而是处在“道德休眠”状态，看着自己亲手为他人造成的痛苦而无动于衷。这些人之所以会进入“道德休眠”状态，是因为科学的权威与绝对性，科学实验如何要求，就如何做。

现代科技对道德的排挤与压抑有多种直接形式，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电子媒介技术。与印刷媒介突出词语概念和抽象思维不同，电子媒介借助影像强调戏剧化，“在这种强调中，电视新闻青睐灾难和人类悲剧，它唤起的不是净化或理解，而是很快会消失殆尽的滥情与怜悯情绪，以及对这些事件的伪仪式感和伪参与感。”<sup>[13]</sup>用桑塔格(S.Sontag)话说，我们所处的电子媒介盛世是一个“奇观社会”<sup>[11]100</sup>，所有的社会现实都要被电子媒介的大口嚼掉变成影像奇观吐出来，否则就不是真实的，就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强调戏剧化的电子媒介遵循“语不惊人死不休”、“无奇观，毋宁死”的金科玉律，什么题材和内容最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当然是苦难、灾难！

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一打开电视、电脑，世界上的各种灾难和不幸就会走到你的客厅、卧室，伴你就餐，伴你入眠。苦难因此具有了日常性，融入了我们日常的世俗生活。但“犹如所有的传统事物，它们一旦‘融入了世俗的日常生活’，就失去了所有的震撼力。”<sup>[14]</sup>即使是再具有同情心的人也会产生“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因为日常性的另外一些表达方式就是“如是性”、“理所当然性”，不再会去追究“为什么是这样”。苦难的日常化使我们以为苦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再去深究苦难产生的原因，当然也不会作出相应的反应。

日常化的苦难不是我们每日生活中剂量很小的“调味品”，而是我们每日生活的“正餐”，将我们喂得饱饱的，达到了一种“超饱和状态”。饱和伴生着麻木，苦难的饱和伴生着道德上的麻木不仁。为了激起已经麻木的情绪，电子媒介必须加大刺激的强度，暴露更多、更露骨的苦难，以至于形成一个变本加厉的“苦难循环”！结果是，以前令人厌恶、令人胆寒、令人发指的暴行、苦难，在电子媒介时代的人看来，只是小菜一碟。桑塔格对此有清醒的

认识：“我们被那类曾经带来震撼和引起义愤的影像所淹没，渐渐失去了反应的能力。同情已扩展至极限，正日趋僵化。”<sup>[1]99</sup>结果是善良、同情、怜悯等等人类美好的道德价值不是被封闭、压抑，就是被弃若敝履，无处可寻；而反人性的暴行、苦难、冷漠、麻木等随处可见。

电子媒介的戏剧化追求其实只是其娱乐本性的一种表现。“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sup>[1]51</sup>电视的这种消遣与娱乐功能是生产者预设好的，我们购买的就是这种功能。作为“元媒介”（波兹曼语）的电视如此，其他电子媒介也大抵如此。实际上，电子媒介大量裸呈血淋淋的灾难、苦难影像，本来就不是让我们同情的，而是让我们娱乐、消遣的，也就是说，苦难是作为消费品提供给大众的。他人的痛苦、别人的苦难成了人们就餐的佐料，成了饭后的谈资，现代人的道德冷漠不是必然的吗？

道德冷漠的现代生产机制除了以上几种以外，还包括网络化和城市化。网络创造了一种新的存在空间，在这种存在空间里因为“相遇的脆弱”而导致义务的淡漠；网络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近”中有“远”，而“近中远”的悖论性境遇导致了责任的飘零。<sup>①</sup>都市是陌生人的世界，为了自我保护，冷漠成了都市人的处世之道。<sup>②</sup>另外，这些机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综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无论是电子媒介、精细分工，还是现代组织、网络化和城市化，里面都有科技的力量；电子媒介与城市化、精细分工与现代组织之间都是血脉相连、很难截然分开的。总之，不是哪一单一机制，而是这些机制的共同作用造就了现代社会、现代人的道德冷漠。

### 三、教育不能冷漠

如前所述，道德冷漠是对人性的否定，如果任由道德冷漠的现代生产机制发挥其强大的生产功能，人类的未来将会相当危险。正是认识到了这种危险，我们时代的思想者对现代性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批判，现代社会也发生了、正在发生着变化。学校教育作为一种自觉的、超越性的文化事业，虽然无力以一己之力抵挡道德冷漠的现代生产，但也不能以此为借口放弃努力，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甚至冷漠旁观、助纣为虐。实际上，只要保持清醒，在坚守中创新，学校教育还是可以贡献自己柔韧而绵长的力量的。

#### 1. 学习共同体的建构

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一头连着家庭，一头连着社会，始终处在家庭和社会的拉扯之中。在学校发展史的早期，学校作为家庭功能的延伸，有着更多的家庭色彩。如果说家庭是人的“第二子宫”的话，学校则是人的“第三子宫”。直到20世纪早期，学校依然偏向于家庭这一头，比如杜威就认为学校生活“应当从家庭生活里逐渐发展出来；它应当开

展并继续儿童在家庭里已经熟悉的活动。”<sup>[16]</sup>处在这一阶段的学校，继承了家庭的情感性，更类似于关怀社群。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学校与家庭渐行渐远，一头扎进社会的海洋里，成了众多社会机构中的一种。尤其是“20世纪以来，学校规模愈大，结构愈科层化，其许多特征与韦伯的‘理想类型’科层制机构特征相似。”<sup>[17]</sup>

与现代机构同质、同构的学校虽然进行着道德教育，但也在生产着道德冷漠。第一，现代学校犹如现代化工厂，服从于专业化与效率的要求，“把大量学生(原料)集中在中心学校(工厂)里，由教师(工人)加工”是“工业社会的创新”<sup>[18]</sup>。现代学校批量生产的是适应现代精细分工的“残废、孤立而又失望的个体”，正如前文所述，是功能化的产品，是“道德钝化”的个体。第二，“学校对学生做了全部现代机构对全体人所做的事情：他们把生活过程制度化了，由此在总体上破坏了生活过程，生活过程本该以一种自然且自由的方式展开。”<sup>[19]</sup>受教育的儿童，在人生的早期，就逐渐适应了只见制度、程序、规范、纪律而不见同情、信赖、依靠、道德的生活。第三，求学的过程犹如障碍赛跑的过程，同伴之间的生命关系被扭曲为“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他人都是自己“跑道上”需要跨越的障碍，不幸灾乐祸已经相当难能可贵，怎么可能对掉队的弱者表示同情!

因此，学校教育要想在抵制现代社会的道德冷漠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首先进行自我改造——由现代机构走向学习共同体(**community for learning**)。波伊尔为我们描述了这种学校的理想状态：“一个目标明确的场所；一个相互交流思想的场所；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场所；一个纪律严明的场所；一个相互关心的场所；一个欢庆聚会的场所。”<sup>[20]</sup>这样的学校充满了人性关怀，不再与现代社会一起生产道德冷漠。学习共同体的目标在于学习，不在于在激烈竞争中战胜别人。作为共同体明确目标的学习，也应做回归本义的理解——既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与他人交往、走向他人和与自己对话、认识自我。彼此间的相互意识是人类独有的发明，在现代机器丛林中生活的现代人、孤单少友的儿童都渴望交往，相互交流思想既能满足需要，又可孕育对他人的关怀。正义和纪律是建构共同体不能缺少的两个要素，因为学校毕竟不同于自在性的家庭，而且，正义感和纪律性也对人的道德感的培育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代学校虽然也将学会关心挂在嘴上，但如果学校不关心学生，那学校教给学生的则主要不是关心，而是冷漠。如果我们要想使每一个孩子都学会关心，那么，我们必须首先关心每一个孩子。作为学习共同体，学校不同于冷冰冰、硬梆梆的现代机构，而是一个“好去处”，一个孩子们爱去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享受这里的环境和气氛，爱这里的人。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样的学习共同体是否可能。应该承认，在目前这种功利化教育现状下，一步到位性地建构几乎没有可能。但也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学习共同体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现实依据的空中楼阁。第一，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对人才类型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代社会更需要有丰富个性和创造性的人。第二，与人接近、与人进行面对面交往是人性的深度渴求，而电子邮件、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这类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只会导致间接互动的增加，人们更多的是与电视和电脑屏幕互动，而不是与鲜活的面庞相对，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无声化”<sup>[21]</sup>，人与人之间越来越自我隔绝。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面对面交往空间，正可弥补社会“无声化”的缺憾，成为满足人性需要的处所。第三，代际“成熟差”或“不对称性”是学校存在的人类学依据，正是因为两代人之间存在的多种差距，学校的存在才有必要。但在电子媒介时代，两代人的“不对称性”正在消逝，学校的合法性正在消解。在这种趋势下，学校也应该寻找新的合法性依据，学习共同体建构应该是努力的方向。<sup>①</sup>最后，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人口出生高峰的回落等多种原因，学校和班级规模有变小的趋势，这也为学校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微观条件。原因很简单，巨型学校容易导向科层化机构，而规模较小的学校容易成为类似于家庭的情感性组织。当然，很多所谓没有可能性的问题，本身并不是真的没有可能性，而只是因为我们在旧的轨道上跑得太久了，不愿意尝试新的道路罢了。也就是说，根本的问题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 2. 学校的媒介与网络意识

电子媒介与网络都有“教育意识”，包括与学校争夺时间和注意力的意识——如今人们花在看电视和互联网上的时间加在一起甚至已经超过了工作或上学的时间；用完全不同的“教育哲学”解构、挤压、代替学校基本理念的意识。反过来，学校也应该有媒介与网络意识，不然的话，学校在与电子媒介、网络的这场持续不断的竞争中注定会输光所有“家底”。

学校的媒介与网络意识包括坚守自身特性的意识、揭示媒介与网络危险的意识、弥补媒介与网络缺陷的意识。在电子媒介与网络盛世，学校教育很容易经受不住强势存在的拉力，倒向对方，进而失去自我。比如，教育信息化、网络化的声音一直不断，很多教育从业者都渴望用电子信息和网络技术来改造学校。这样一来，一方面，电子媒介和网络在道德上的“毒副作用”就迁移到学校身上，学校教育也会成为“苦难饱和”的机制，成为义务淡漠、责任飘零、道德冷漠的生产机制。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会失去学校这一反对、抵御、制衡道德冷漠的重要阵地和力量，道德冷漠将会更加大行其道。如果学校能够坚守自身特性，就可

发挥自身心灵沟通、情感交流、精神际会、道德熏染、经验分享等独特作用，制衡、弥补电子媒介和网络所导致的道德冷漠。

虽然电子媒介和网络给学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学校不是反电子媒介和网络的，坚守自身特性不等于排斥将电子媒介与网络运用于教育过程，充分挖掘其教育潜力。与此同时，学校教育还要向学生和社会大众揭示电子媒介的危险性，培育媒介与网络批判意识。在电子媒介与网络盛世，电子媒介与网络的逻辑最容易蔓延、扩散，将诸多事物裹挟而入自己的逻辑，甚至悄悄改造着人性。学校教育如果能够揭示电子媒介的娱乐本性和对苦难的过度兴趣，暴露网络空间中身体退隐的道德后果，包括伦常的松懈、人际的粗鲁，义务的淡漠、责任的飘零等，成为电子媒介和网络盛世的清醒的超越性存在，就可一定程度上缓解、抵御因信息技术所导致的道德冷漠。

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已经证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在人的诞生和发展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可以说交往需要已经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沉淀为人性的内在需要。电子媒介和网络一方面扩大了人类的交往面积，使“天涯若比邻”；另一方面又置我们于陌生人的世界里，使我们或者面对的只是“人的碎片”，无法进行深度的思想和感情交往，或者通过电子媒介进行间接交往，无法感知对方的呼吸和脉动。机器和电子媒介扩大了人类的能力，但却占据了家人、伙伴和朋友在我们身边的位置，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疏离，人性的深度需要无法得到满足。作为学习场所的学校，如果能够反省自身、回归本义，在运行过程中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持久的交往和对话关系，不正可适当弥补电子媒介和网络交往中的短暂和疏离关系所导致的道德后果吗？不正可以为面对面的交往提供方便、满足沟通交流的人性饥渴吗？

### 3. 远距离道德的建构

忧那思认为人类目前所秉持的伦理学是“近距离伦理学”<sup>[22]</sup>。这种伦理学关注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再往大了说也只是同一种族、同一文化的当代人之间的关系。鲍曼也认为现代道德符合“视觉法则”：“靠近眼睛，它就庞大而厚实；随着距离增大，对他人的责任就开始萎缩，对象的道德层面就显得模糊不清，直到两者达到消失点，并逸出视野之外”<sup>[5]251</sup>，因此是“亲近道德”（a morality of proximity）。这种道德的源头在于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那时我们祖先的小型群体受到了选择，因为小群体对生存具有优势，相应地，小群体间的亲情、互助、支持等行为方式通过自然的选择由个体继承下来，并逐渐沉淀、发育为人类的道德原型。

正是这种道德使我们处在一种两难境地之中，“我们继承了人类在史前史中形成的道

德倾向结构，可在战胜现代生活世界的挑战中这些道德倾向结构对我们人类与其说是帮助还不如说是一种障碍。”<sup>[23]</sup>因为一方面我们人类的能力空前强大，能够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遥远的人，一个人的一个欲念甚至可以改变千千万万远方或后世的人的命运；另一方面，我们的道德又是如此的短促、无力，非常依赖于空间、时间和群体上的亲近，超出这种亲近，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只手太长了，而另一只手则太短了”。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一个以距离和疏远为基本特征的社会里，这种道德不是过时了，而是不够用了，所以需要增添一种新的伦理学，即“远距离伦理学”：一种对时间、空间和群体上遥远的人负责的伦理学。鲍曼认为远距离伦理有两个要点，一是自我限制，一是对恐惧的探索。<sup>[8]256-257</sup>所谓自我限制，就是要摆脱道德冷漠的现代生产机制所派生的责任推卸意识与习惯，时刻警惕自己作为或不作为对他人，包括“遥在”的他人的影响；所谓对恐惧的探索就要增强人们对不确定性和厄运的预测，增大人们的道德想象力，进而激发人们的道德敏感性。除这两点之外，远距离伦理学还应该有三个维度，即博爱。博爱是对距离和亲疏的超越，剥去了我们行使道德行为的种种前提性条件，是一种无条件的人类情怀。只要有那么一分博爱情怀，我们对“遥在”的人们就会多一份关心和责任。

显而易见的是，远距离伦理学不是学校教育所能单独建构的，但学校教育和德育，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一，教育和道德教育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培养自律的人。学校教育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由许诺物质享受的前景转向孕育自我节制的人)，增强自律和节制的教育内容，在学校生活过程中贯彻自律精神等等方式实现自律的人的培养。第二，教育和道德教育可以加强“风险社会”的教育，帮助学生充分认识人类目前所处的危险无处不在、不可预料的境地，拓展学生的道德想象力。第三，教育和道德教育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激发人类成员的共同命运感。在全球化的风险时代，共同命运不再是杞人忧天者的一个虚构，而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教育的任务就在于促使年轻一代尽快认识到这一点。第四，教育和道德教育可以进行博爱与普世伦理教育。既然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人类就应该有一个超越不同群体的共同伦理。教育的任务就在于在塑造民族精神的同时又不为民族精神所囿，传播普世伦理，为远距离伦理学的建构奠定基础。博爱作为超越性的人类情怀，其达成相当困难。但不能因为困难，学校就完全放弃。诺丁斯认为，许多人之所以不能将自己对亲人的关心扩大到陌生人，主要原因在于不能正确认识自我和他人。正是对自我的错误认识，导致对他人的冷漠、贬低、曲解和仇视。有时候群体就是一个膨胀的自我，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其他群体及其成员的冷漠、贬低、曲解、仇视源于对自己所属群体的错误认识。在一个

多元时代，对他人及其所属群体的正确评价，也是决定我们是否对其投入感情的标准，而对他人的正确评价来源于与他人的交往和对话。<sup>[24]</sup>因此，正确认识自我，正确理解、评价、包容他人应该是当代学校的教育主题之一。

#### 参考文献：

- [1]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2]吉尔·利波维茨基.责任的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M].倪复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3]高德胜.电子媒介与旁观者的生产——论道德教育在电子媒介时代的选择[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4):30-37.
- [4]R·W·费夫尔.西方文化的终结[M].丁万江,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 [5]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 [6]阿尔贝·雅卡.科学的灾难?一个遗传学家的困惑[M].阎雪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
- [7]巴里·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M].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 [8]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9]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精神的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42-43.
- [10]彼得·布劳,等.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M].马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8.
- [11]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郁建兴,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304.
- [12]奥特弗利德著·赫费.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M].邓安庆,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11-113.
- [1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11.
- [14]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22.
- [15]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2.
- [16]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7.
- [17]珍妮·H·巴兰特.教育社会学:一种系统分析法[M].朱志勇,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25.
- [18]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M].孟光军,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349.

[19]克里夫·贝克.优化学校教育——一种价值的观点[M].戚万学,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1.

[20]厄内斯特·波伊尔.基础学校——一个学习化的大家庭[M].王晓平,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22.

[21]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4版,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4.

[22]甘绍平.应用伦理学的前言问题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114.

[23]克劳斯·德纳.享用道德——对价值的自然渴望[M].朱小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7-8.

[24]内尔·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M].于天龙,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50-156.

## **Moral Indifference and Moral Education**

GAO De-sh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Moral indifference, in another name, “responsibility shifts” or “moral numbness”, is a seemingly denial of responsibility while essentially a denial of humanity. Moral indifference leads to very serious consequences to both our humanity and society. In modern society, there is a self-contained system to produce moral indifference, which includes the moral passivation caused by elaborate division of work, de-moral trend in modern organizations and the over exposure of tribulation in the electronic media. However, education can never be indifferent. We should avoid the expansion of moral indifference by setting up our schools as the community for learning; cultivating the sense of criticism towards the media and the Internet, and constructing the distance moral.

Key words: moral indifference; moral education